

缅甸以中国技术转移构建数码威权主义

苏孟达津昂

缅甸将领刚刚完成大选，这距离他们在2021年发动的军事政变已近五年。在投票（于2025年12月28日至2026年1月25日分三阶段举行）前夕，安全检查和数码审查激增，成为日常现实。当局拦停民众，进行搜查，并命令他们解锁手机；这预示着缅甸政权意图通过数据控制而非选票，巩固长期权力。

缅甸军方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备数码监控能力。他们最新的武器是许多人看不见的。据报道，“个人审查与监控系统”（Person Scrutiniz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，简称PSMS）——一个数码筛查与追踪系统——利用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摄像头网络，直接接入中央监视名单。缅甸人权组织于2024年警示PSMS的出现，称它为部署在检查站、酒店和交通枢纽，并与缅甸身份登记系统相连的全国终端网络。

PSMS只是整个系统架构的冰山一角。自2022年5月以来，缅甸军方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，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库系统，收集生物识别和家庭信息。到2023年末，它宣布已将超过5200万份生物识别身份记录数码化（这几乎是全国人口的总数），以及超过1300万份家庭登记文件——实质上，是一个近乎全民的人口登记系统。智能生物识别卡（附带指纹、虹膜和人脸数据）的推出，被宣传为一项行政升级措施，实则促成中央身份识别系统的建立，将公民的出入境、治安记录、酒店入住登记和

尽管仍未完善，但缅甸的数码监控型政权已发挥威力，因为早在系统完全整合之前，选择性执法就已引发人们的恐惧和自我约束。缅甸这一发展趋势在亚洲并非特例。

地方行政事务统一锚定。

电信监控已随着PSMS的实施而扩大。到2023年，当局加强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于2016年启动的SIM卡实名注册的执行力度。

与国民身份证相关联的SIM卡注册，使得通过手机银行进行的金融交易在调查过程中，越来越容易被政府掌握。由于每个电话号码都对照相应的国家电子身份证数据库进行检查，公民的手机现在成为一个身份信标，将他们的行动和数码活动（通过他们使用的应用和社交网络）与国家的生物识别登记系统关联起来。这种与身份证关联的注册，结合智能卡和PSMS，使缅甸的电信网络成为人口的“活地图”。

这些基础设施大部分并非本土产物。对缅甸这个监控型政权的采购审计追踪，直接指向中国供应商。路透社的调查报道称，由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发起，并在2021年军事政变后迅速扩展的缅甸“安全城市”（Safe City）项目，依赖中国的华为、海康威视（Hikvision）和大华股份（Dahua）提供人工智能人脸识别闭路电视、车牌识别器和集中监控软件。Fisca Security & Communication和Naung Yoe Technologies等当地中介公司，从中国这三家最大的公共安全和人工智能监控设备制造商进口、安装并维护监控硬件。2021年之前，仰光约有3000个摄像

头分布在1000个地点。自2021年以来，当局便通过将闭路电视录像中的人脸与数据库进行匹配，来逮捕抗议者。

另一个关键层面是中国式国家防火墙，据报道于2022年中旬首次试用，旨在集中国家对互联网流量和过滤的控制。缅甸政权随后启动一个深度包检测系统（deep packet inspection system），配备中国公司的过滤工具。这些工具构成防火墙的骨干，能够审查网站、通过元数据监控加密通信，并将可疑模式输入PSMS的管道。凭借人工智能增强型摄像头、实名SIM卡身份和人脸识别技术，并将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，政府甚至能在抗议活动形成之前，就识别、匹配并标记公民。缅甸政权现已将最初分散的城市监控整合到国家数据库中，并融入人工智能工具。

当备受争议的《网络安全法》于2025年生效，要求平台保留用户数据并应要求移交时，PSMS开始将身份证号码和与SIM卡关联的个人资料，与中央数据库的“通缉犯”交叉核对。据报道，PSMS在2025年3月至5月期间，至少对1657人发出逮捕警示。一名当地安全专家解释说，这些逮捕行动似乎是借助国家数据库对关联的姓名、电话号码和人脸进行的自动化匹配。

然而，军政府的监控能力扩张速度，快于治理

能力。它已从曾经维系国家运作的老旧情报网络，转向进口的数码系统。据一名当地安全行业内部人士透露，系统尚未完全整合，当局仍严重依赖法律工具、人工情报和手动筛选的监视名单。数码监控执法主要针对约5万名与政治反对派、公民不服从运动和抵抗网络相关的人士。

尽管仍未完善，但缅甸的数码监控型政权已发挥威力，因为早在系统完全整合之前，选择性执法就已引发人们的恐惧和自我约束。

缅甸的这一发展趋势在亚洲并非特例。巴基斯坦由中国援建的“安全城市”系统，在主要城市中心广泛安装人脸识别闭路电视，柬埔寨则寻求将中国式监控平台整合到安全机构中。总的来说，中国的公共安全模式似乎已发展成为一种可移植的模板，供寻求扩大强制力的国家使用，尤其是那些在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时，转而诉诸控制技术的政府。

缅甸的案例凸显出，当今的数码威权主义，与其说依赖于国内的制度优势，不如说是依赖于从愿意出售者那里进口技术的能力。正在兴起的由监控基础设施驱动的数码威权主义做法，而不是选举，将在未来几年决定缅甸的政治自由界限。

作者Su Mon Thazin Aung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缅甸研究项目客座研究员
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兼任助理教授
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Fulcrum网站
黄金顺译